

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 的主要内容及文化意义

黄适远

(新疆艺术研究所·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弥勒会见记》共27章,哈密文本有25章,为世界上最为完整的版本。《弥勒会见记》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同时也是一本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的出现和形成正是文化交融后所形成的西域佛教艺术特有风格的舞台戏剧。至唐代,西风东渐,最终对于中国戏剧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弥勒会见记 回鹘文本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577(2010)02-0012-03

一、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产生时代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在哈密的问世,令倾心于西域文化研究的中外学者们无不为之瞠目,让中外学者的目光一下聚焦在了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新疆东大门身上。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因为牙和亚·热衣木的发现重现人间散发出千年的光芒,而牙和亚·热衣木也因此把自己的名字和《弥勒会见记》紧紧交织在一起。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是牙和亚·热衣木所在的民族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留下的东西。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文是唐代时回鹘的文字,也叫古突厥文。回鹘本来叫回纥,后来报经唐政府同意后,改名为回鹘。即轻捷如飞鹘。回鹘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唐代,回鹘是大唐帝国忠诚的战士。回鹘著名将领契必可力是唐太宗非常器重的大将,在征伐高昌鞠文泰的叛变时,契必可力被封为行军副总管,^{[1](P.297)}作为名将侯君集的副手,参加了讨伐战役,一举荡平了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回鹘经历了几次重要的信仰,除去古老的信仰萨满教外,他们还崇信过祆教、佛教、摩尼教。

关于佛教在西域盛行的情况,从玄奘到法显几位大师都曾忠实的予以记录过。大约在5世纪开始直至伊斯兰教进入之前,西域各地佛教的分布情况是:以于阗(今和田)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主要信仰大乘教,这也是塞人为主居住的地方;以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西部、南部地区信仰小乘教,这一带地区主要生活的是大月氏人;而当时的高昌地区基本是大乘教,这也包括东疆的伊吾(哈密)。祆教和摩尼教都是从古代波斯传入的。说到西域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我们有时过多看重了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以及改造,却对古代波斯文化的输入和造就没有真正予以正视。塞人、大月氏人皆来自古代波斯,他们的到来,带来了祆教、摩尼教,对于打造西域文明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而这一切,最终也融入进了中原文化系统中。至今在哈密和南疆地区穆斯林群众过的重要节日——诺鲁孜节,就是祆教的文化传统。祆教崇拜火,摩尼教崇拜光明。回鹘汗国在牟羽可汗时期,摩尼教被定为国教,在天山南北有了很大发展。我认为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

收稿日期 2010-04-14

作者简介:黄适远(1969—),男,浙江嵊州市人,新疆文化厅新疆艺术研究所·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见记》可能产生于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即9~13世纪。这一时期,正是高昌回鹘王国佛教蓬勃发展的当口,哈密绿洲属于高昌王国管辖。高昌的佛经翻译事业空前高涨,高昌发现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妙法莲花经》、《楞严经》等都是这时候翻译出来的。哈密既是属于高昌的领地,在这方面肯定深受其影响,哈密版本的《弥勒会见记》和高昌的《弥勒会见记》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二、《弥勒会见记》的主要内容

《弥勒会见记》又名《弥勒三弥底经》、《弥勒下生经》,回鹘文为maitrismit,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同时也是一本大型佛教剧本。属于佛教小乘派,取材于未来佛弥勒成佛和解救众生的故事。它是由当时在东疆地区知名度极高的高僧圣月大师根据梵文翻译成吐火罗文,再由一个叫波热塔那热西提的翻译成回鹘文。从这也可以判断出,当时哈密绿洲生活的主要居民就是回鹘,据专家的研究成果,吐火罗是已经从敦煌、哈密、巴里坤被匈奴打败后迁到焉耆的原大月氏人。唐代称大月氏为吐火罗,这是一个极度崇信佛教的民族,佛教在西域大地的盛行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

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和焉耆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是这一时期活生生的文化样品,尤以哈密文本为世界最完整。《弥勒会见记》根据专家的意见,共27章,哈密文本有25章,吐鲁番文本仅剩残页,焉耆的吐火罗文本也只剩下不多的几章,哈密文本成为了至宝。剧本内容是,年逾120岁的婆罗门僧婆婆离,在梦中受天神的启示,想去拜访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老态龙钟,不能亲自前往,便派弟子弥勒等16人,代表他去谒佛致敬,恰好弥勒也在其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允。婆婆离告诉弥勒等人,如来佛身上有32个人像,只要看到这些人像,那就是如来佛,就可以将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他。弥勒等人奉师命来到如来佛身边,果然看到32个人像,便提出大道青天、凡物人间等几十个问题请教32个人像分别答问,答辞明晓易懂,道理深刻,使弥勒得以受益,遂入佛道,而自称弥勒佛。

《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翻译者圣月是唐代著名的佛学家和经书翻译家,他与当时焉耆的法来高僧、福受高僧等佛学家在西域都颇有盛名。圣月将《弥勒会见记》从梵文译成吐火罗文,后经回

鹘翻译家译成回鹘文本。

无论是从《弥勒会见记》表现出的从容不迫的内容来说,还是从其炉火纯青的语言风格来讲,都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剧中语言优美,比如天中天佛尊者阿难陀的一段话:“她以世上罕见的奇珍异宝装饰并创造了我,而我最纯洁的斋戒装饰了她。她以山珍海味养育并满足了我,而我又以仁慈的智慧使她沉浸于幸福之中也满足了她。她以世俗之水冲洗创造了我,而我最圣神的八流之水冲洗了她,并将八十八种耻辱和烦恼之浊从她的胸前心中洗净。她以世俗的花朵装饰了我,而我最菩提之花卉装饰了她。所以说世俗财产很难与上述的功德相提并论。”^{[2](P.214)}通过作品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和完美的艺术手法以及演员的相互对白、独白、旁白以及对人物形象特征、心理活动、情感变化和场景、气氛、时间、地点、服装、布景、道具、音乐、动作等方面精辟的语言文字描绘,以充实可信的故事情节,成功地运用舞台表演形式体现出来,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西域戏剧的成熟被完美地体现出来,给了我们充足的想象空间。

可以说,《弥勒会见记》的出现和形成正是文化交融后所形成的西域佛教艺术特有风格的舞台戏剧。这种惊人的成熟正是多元文化营养催生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戏剧而言,也正是有了西域戏剧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才赋予了中国戏剧丰盈的文化魅力。也正是如此,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再来审视这一切时,就会发现,只有文化的多元交融,才会生长出独特的本土文化,乃至造就出底蕴丰厚的地域文化来。伊斯兰文化进入后,回鹘时代的信仰和文字被彻底弃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论是从心理还是文化上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在寻找西域文化的多样性时,回鹘文及当时所信仰的佛教文化成为研究西域整体文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在西域相当长的时期里,西域是盛接佛教文化的钵,在佛教文化的渗透中,从今天佛教残留的遗址中我们仍能感觉到那如潮水一般的气息。从西边的喀什噶尔的莫尔佛寺,中部佛都龟兹——今天的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东部佛都高昌——今天的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再到我们这个新疆东大门——哈密的白杨沟佛寺,都见证了这一时期佛教文化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

三、《弥勒会见记》的文化意义

尽管对于《弥勒会见记》的具体产生年代有学者还在争论不休,但总的看法已经基本有了共识,应当在唐朝突厥牟羽可汗时期形成。这一时期是西域文化在汉代以后和中原文化极度交融的时期。但我个人更愿意倾向与另一种说法:《弥勒会见记》的最早版本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就已出现,大约应该首先出现在龟兹一带,这是因为吐火罗人也就是大月氏人醉心于佛教,而西域当时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就在龟兹,它强烈的辐射让整个西域都感受到了佛教发出的光芒。由于在汉代就开始的西域和中原的文化交流早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进入中原,所以《弥勒会见记》的出现应该不会晚于这个时期。特别是佛教的传入绝不仅限于说教那么简单,应当有其它更加老少咸宜、通俗易懂、形式活泼的方式,通过人物故事情节的演绎,更有利于吸纳人群和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讲,戏剧《弥勒会见记》的诞生在汉代就已出现绝不会是空穴来风。至于到最东部哈密文本的发现和出土,则更显示了这种西风东渐的传播过程。这个发现和出土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仅证明了回鹘民族对于佛教文化的深深浸染,更为重要和积极的意义在于佐证了西域戏剧在当时的高度成熟,而这个成熟期更早在公元初就已出落的得体而仪态万方了,到了唐代时,不断西风东渐,对于中原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戏剧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9世纪初,回鹘分为三支,葱岭回鹘、高昌回鹘、甘州回鹘。从哈密——敦煌——张掖基本上为高昌和甘州回鹘的地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熏陶,造就除了迥然而异的文化风格。葱岭回鹘和高昌回鹘被伊斯兰化后,佛教文化基本全

部退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信仰的转变造就出了新的文化传统。甘州回鹘包括附近的沙州回鹘则一方面保留了过去的文化,一方面和同属于佛教系统的藏传佛教进行了融合,更由于和蒙古族的交融,形成了新的民族载体——今天的裕固族。甘州回鹘曾经是龟兹回鹘的一支,到河西走廊被称为“黄头回纥”,以后又称“撒里维吾尔”、“黄维吾尔”,以示和新疆维吾尔的差别。其民俗、服饰、民歌、信仰都与新疆维吾尔族不同,成为两种文化形式,也堪称是历史在那一瞬间写下的一个清晰的记忆。

哈密遗存的大量佛教残址,见证了佛教文化的兴衰,目睹了伊斯兰教文化的崛起。在文化的游动中,《弥勒会见记》幸运地留存了下来,这注定是一个奇迹。那个在逃避中慌忙把这个剧本藏进树洞的教徒怎么也无法想到,正是他这虔诚而又无奈的举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给浓墨重彩地哈密文化史饱添了一个沉甸甸的文化符号。一个在历史的记忆深处,曾有过辉煌历程而又隐匿多时的珍宝,光亮又鲜活地在不经意间重现人世光彩重生。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7.
- [2]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J].文史,1981,(第12辑).
- [3] 季羨林.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J].文物,1983,(1).
- [4] 多鲁坤·阚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A].曲六乙,李肖冰.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李开荣)

The Main Content and Sighificance of Hami Hui Mile Interview Note

Huang-Shiyuan

(Xinji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Urumqi,Xinjiang 830002)

Abstract: There are 27 chapters in Mile Interview Note, and Hami text has 25 chapters. It is the integrated text. It is the most and biggest Sutra of Hui text, and also is Buddhism play. The appearance of Mile Interview Note is the culture mingle and forms the stage drama which has West Region Buddhism art style. Until Tang Dynasty, i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 of Chinese play.

Key words: Mile Interview Note; Hui text; Culture significance